

WANGXIAONISANWENSUIBIXILIE

湖南文艺出版社

派什么人去受难

王小妮散文随笔系列之四



派什么人去受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派什么人去受难

王小妮 著

责任编辑：萧 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202,000 印数：1—5,000

ISBN 7-5404-1909-1
简易精装：I·1513 定价：10.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前言 事情正在起变化

王小妮

交给出版社的四本书稿,在我自己这儿其实是有顺序的。从《目击疼痛》开始写,然后是《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我们是害虫》,最后动笔的是《派什么人去受难》。

在《派什么人去受难》的书名之下,本来还有四篇文章的题目:“什么东西是我的”、“你在深圳那个地方做什么”、“木匠致染匠”、“劫后之劫”,每个题目下面已经有了一些文字。

一九九八年的春天,天气并不太恶劣,雨水不重。听说广东大面积的土地都干旱,荔枝将大幅度减产,这对我这个个人的影响极小,我是可以没荔枝,却不能没土豆的顽固北人。

天气的确不太坏。我在家里来来回回地走,我想:谁说 I 非要写呢,人怎么可能像机器一样,滴几滴油就永远工作?

对于我,这已经是一个经久不散的疑问了。像海底的长藻,一有风浪,它就把黑沉幽暗的飘带卷到蓝色的水面上来。

几年前,我翻过一本地摊上的杂志,它详细地回忆了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发生过的事儿。我注意到毛泽东当时说过一句话:事情正在起变化。后来,他好像把这作为他一篇具有杀气的文章的题目。几十年的时间,这个短句已经能够轻松随意地从产生它的背景中抽离出来。我看见了它的另外意味。

事情,和云起雨落一样,随时都在变化。天是微晴的,墙上并没长满霉斑,但是,人开始厌倦。没有谁规定我必须活着,所以,没有谁规定我必须写,事情的确起了变化。

理解写好散文随笔,必须面对一种直截的攫取。

我想停止了。那四篇文章的片断被我从夹子中抽出去。

我想尽快封闭我的矿。重新让毫无价值的碎石头和泥土把这座曾经翻开的山坡覆盖。半年之后,将有杂草生长,三年之后,将有杂树灌木生长。我喜欢再看见我的头顶上荒草萋萋。

一个人对他每天都做的事情能保持同质的热情吗?我以为不可能。我要我的纸们重新包裹掩藏起我的火。

记得在八十年代以前,城市里有专门的劳动保护用品商店,卖高筒胶靴和粗线手套之类。我认识一个理发师。每个月,他能领到一小包配给的黑木耳。他说,黑木耳吃了能清肺,是对理发师的特殊待遇。

什么东西能保护一个写作者?

不知道其他的人,是不是在写作散文和随笔的时候体验到了直取血肉筋骨之后的伤害?

停止,也是一种好的状态。

我接到某人的电话说：你最近状态不错。似乎写作和发表着就是好状态。只有写作匠人的状态才必须依靠纸上的铅字去表现。

不想说话的人，唱歌或者走路或者沉默都能变成他自己的好状态。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个人出门游荡了一阵，他要掏出钥匙回家。诗人也是一样，诗人最终要回到他的寂静里面去。这是他自己找到的最后的保护方式。

目 录

前言:事情正在起变化	1
派什么人去受难	1
随手	18
孩子们	61
中原,在我经过的时候黄了	74
木匠致铁匠	88
背后一块大宝石	105
走吧	115
关于诗歌的笔记	127
一直向北	149
下雪	165
远山	186
为自己的心脏写一份病历	199
我和他,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	213
梁老师	226
我擦洗着我爸爸的脸	235
爸爸	241

派什么人去受难

一九七四年的秋天,我是个普通的插队知青。整天披一件半旧的大衣,挎着柳条编的土篮子,在场院上搬运玉米棒子。

庄稼都上了场,上面调动一批劳动力去修水利。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被指派到附近一间敬老院去看管临时设立的“战地广播站”。我算摊上了最大的“俏活儿”。在越来越冷的秋天里,挖一条

土沟的人成百上千，能坐在炕上管广播的只能有一个人。

因为大喇叭们要求在天亮前播放“东方红”，我必须赶大早去敬老院。

我在漆黑中起来，到外屋的大铁锅里准备摸两个玉米面饼子带上的时候，大锅盖没有立稳，突然倒下来，正好闷闷地砸在我头顶上。锅盖是实心的木头钉的，厚度超过三公分。我给砸得天旋地转。一个人蹲在碎柴禾堆里，哎哟着。疼慢慢缓过来，我摸着黑出门。大衣口袋里，左右各鼓鼓地揣着一只饼子。

那个凌晨极其黑。唯一的光源好像来自光秃秃的土道。没走出几步，全屯子的狗都被我给搅得咬起来。屯子最南端，有孤零零的一个院套，几棵挺直的柳树。那家人家好像姓张。屯子里的农民都不愿意走张家门前的土道。因为他家养的狗不只看家，还要霸道。我已经又小心又害怕，走得尽量轻了。狗好像一直埋伏着，等我走近，突然跳上来狂咬。我不能看见，但是感觉到一种向上扑过来的气流。我只有快跑，还慌乱地掏出口袋里的饼子，把它们狠狠地扔出去。我根本不知道扔掉饼子的用意，是准备打狗，还是想吸引狗，堵住它们的嘴。

敬老院在大约三里地外。没了庄稼的地里发出呜呜的风声。逃离开屯子以后，我悠闲多了，已经能望见立在缓缓岗上黑压压的敬老院。突然，在非常近的地方，几乎是撞在怀里，呼呼啦啦地飞起一些什么东西。好像有翅膀碰到了我。再次拼命跑了一阵，我的心里一阵狂跳。后来，别人估计，是在道边枯草里睡觉的野鸡被我惊飞了。

敬老院养了不只一条狗，是附近名声最恶毒的狗。不知道有多少条，迎着我狂叫，使我不可能接近敬老院的破门。口袋里没有玉米饼了，恍恍惚惚地看见地上有树枝形的东西，马上去捡。结果是一些软塌塌的谷草。我开始像当地农民那样，高喊：看狗哇！同时向后退，靠上了一棵树。树叉很矮，很容易爬上去。那是我这一

生唯一一次爬上一棵大树。所有的狗把树团团围住，窜起来叫。这时候，有灯光了。由一排小树枝捆扎起来的院门打开。起早做豆腐的老人给我吆喝住狗。他坐在一只狗脑袋上，手还不断地按着其他的狗脑袋。

去放广播那个早上的惊险到这里结束。等我再回到集体户，把这个惊慌恐怖的过程讲给大伙听的时候，是完全当玩笑讲的，别人也是当玩笑听着。事情就这样过去。

单纯地讲述我去放广播的经历根本不算什么苦难。有许多时候在近处，我们只可能见到水，退到远处才可能看见一条滔滔的大河。而苦难正是由水珠们组成，由忧伤、无意义、平淡，甚至玩笑逸事，甚至是快乐，组合在一起的一个大事件。真正的苦难会大到包涵了一切。苦难，就是生活本身。

我的一位同学正在搜集整理一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的纪念册。在他已筹集到的几百张照片中，几乎百分之百都拍下了欢乐和笑容。谁都清楚，留在照片上的痕迹，只是这一运动中的一个侧面，甚至是造出来的场面。但是，我们能够看见的只是这些。包括当时留下来的日记、诗歌、书信。在那个年代，能有人敢留下明确的疲惫不堪、悲哀无望、心灰意冷、衣衫褴褛的物证吗？我们曾经习惯了，把许多东西都深深地搁在心里。

有一个人，他当知青时候的日记完全由列宁、毛泽东、鲁迅的语录组成。他不敢写下自己真实的想法。所以，经常为日记中选择哪一个伟人的哪一段话来影射当时自己的某一种心情和事件而费尽心思。二十几年过去，现在的他只能笼统地说，当年每一段日记其实都包含了明确的暗指和隐喻。时光的磨擦，已经使他再不能够把那些名人言论和自己当时所处的具体一天的具体心情相连接。它们完全无情地脱离了他个人，再次恢复成为名人的言论。而他这个人的那段生活早在时间中默默消失。

我去敬老院的经历,如果不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在热炕上喝饱了玉米碴子粥之后,被当成笑话不断地提起来,也绝不会被记忆得这样清楚。永远有事情经历着由鲜枣到一颗干枣核的自然枯萎过程。

苦难,大洪水一样漫上来。人没有可能选择去做一座最高的石头山峰。人只能跟着要命的水去走,去流落。是不是正遭受到苦难,又属于纯粹的个人感受。从来没有谁能替人受难。所谓的宗教故事,总是创造出解救、代替众人的理想角色。耶稣竟然在被钉上十字架的路途中还平静地说,会有人因为他的受难而得到福。我不相信这个,人连自救都不可能,怎么敢奢谈救他。

我完全没有答案。我认为人的手永远碰触不到答案。我们只能做一个被动的领受者。

二

大雪弥漫的天气,长途汽车站的泥房子门口挤着很多农民,寒冷使他们都穿成了黑棉花包。在谁也没料到的时候,长途汽车居然出现了。是敞篷的解放牌卡车。在车头上,相当于鼻子的位置,挂了一块油污的棉布“口罩”,防止发动机被冻。大救星一样护住了鼻子的汽车终于被等来了,人们一齐拥上国道。快乐使每个人的嘴巴都变成了喷白汽的小烟囱。人们迎着汽车跑。车在国道上甩了一个大弯,人们也随着甩一个大弯。汽车还没有停稳,已经有人抓住车厢板翻进去。所有的人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解放牌卡车塞到了“登登”地满。司机从驾驶室跳出来,扣住了车厢后面附加的两条铁链,它们起着加高车厢后板的作用,为防止有人被汽车甩下去。司机扬起棉手闷子,抽打车厢边上的人,让全车的人都蹲下,以降低重心。汽车牛一样哼着,向着县城开了,呛着冒烟。车

尾的人一律用胳膊绕住抖动的铁链。这是满车兴高采烈的人。在这种天气,能有长途汽车已经是奇迹。满车的棉花包挤在一起,很快也冻透了。全身没了知觉,只有高兴还像火炭一样在。

如果这种时候有人站在高处说:看,那一车的受难者!全车的人都会否认。他们抄着袖子,吸着鼻涕否认说:那才是扯淡呢!前屯后屯,缺眼睛的,少腿儿的,心口窝见天都疼的才叫受难。才刚儿,没挤上车的那些人,冻麻了爪,没办法“家去了”的人才叫受难。咱,这是享着福呢。

我也曾经挤在那种解放牌卡车上,一点也不感觉自己是个人,只是一些被搬运走的东西。这种东西唯一的与众不同是,还会高兴。汽车开进县城,人们跺一阵脚,就疏通了血液,可以迈步走了。县城有商店,有大铁桶架在过道里让人烤火,想买什么就有什么。这怎么是受难呢。

九十年代,我几次见到从中国内地运往香港的生猪专列。我们当年想进一次县城的恶劣处境远不如那些猪。它们还可以直立,还有空间走动。南方的气候到零上十度已经是遇见寒潮了。当年,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冷中,和我搭过同一辆解放牌卡车的农民,把头集体歪转向南方了,他们不会赞同我这样去类比。他们说:提猪干啥!猪再自在,好日子也到头了。净等着到香港去挨一刀吧。他们坐在自家的火炕上,灶里是整棵柴。前半截是火炭,后半截支在屋地上,还挂着干叶子。他们活得很好,没有什么苦难。

农民最大的苦难是吃了亏。我听说一个知青和一个农民搭伴儿,骑着车子去公社办事儿。突然下了雨,乡下的土道很快泥泞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只能扛着车走。那段路起码有二十里。两个人心疼脚上的塑料鞋,它们很快会在泥里拧坏。最后,两人把鞋脱下来,藏在庄稼地里,还留下明显的记号。三天以后,再回来寻找藏鞋的地方,它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一双鞋一块多钱,这是吃了大亏。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恶狼一样,终于想出了补救损失的办

法。拐进一个电子,知青在柳树毛子上拎走了一件半新的湿裤子。农民顺手拿了一把飞薄刀刃的小镰刀。丢失塑料鞋的痛苦立刻被抹去。两个人乐滋滋地回了家。

有相当多的人,非常愿意接受遗忘的覆盖。像大地绝对不会去反抗云彩。他们只是承受。然后忘掉。车轮辗转着向前走。他们像车胎一样不去感觉。

三

一直,我都有一种预期。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东西被讲述出来。像萨特的《占领下的巴黎》。它可以提示中国人找到没有想过的角度。日本人和德国人在种族上有极大的不同。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写出萨特文字之中的复杂,也没有讲述出中国人所遭受过的直露杀戮。起码,没有人写出在日本兵刺刀下连吃大米也是一种犯罪,那是昔日居住在中国东北的人们的苦难。当年“满州国”警察厅门前,现在还保留着残断的“围栏”。是一些低矮的石墩,胖乎乎地有点憨笨可爱。石墩之间用装饰性的铁杆连接着。它们多数都在日本人战败之后的漫长时间里被破坏了。没法儿想象,警察厅并不是戒备森严,“围栏”竟然和儿童游乐场门口设置的石头凳子差不多。我问当年的老人,鬼子怎么不修筑座高墙?在这种要地,不可思议。他们一点也没有我的疑问,反而圆睁着眼睛问我:有哪个中国人敢靠近那种地方走?

苦难像大水一样临头,中国人默默地忍受。老舍的手里,到最后一刻也有纸也有笔。但是,他没有留下一个字,就自沉于水中。

中国人似乎更擅长于书写和编织忧愁。是不是中国人理解的忧愁才更接近于美好的境界?而苦难太具体,太惨烈,太形而下,是中国的人所不屑于写的。好的、愉快的事情那么多,为什么要去寻找不愉快?

四

苦难有着多么大的余地！它几乎没有遇见过这样宽阔无阻的盆地，洪水没有理由不肆虐。有数不清的无知觉者，又有数不清的能埋藏平息掉疼痛的人。在这种时候，派什么人去受难，还成为问题吗？

苦难像最美丽清澈的溪水，欢迎一切人拿他短促如草的生命去泅渡。

五

偶然地，我翻到一篇小说，作者是一个日本人，叫大冈升平。我看它更接近一篇纪录性文字。其中有一段关于是不是开枪射击一个突然出现在日本人视线中的美国兵的描述，他写出了当时的犹豫和对自我的心理分析。可以想象，一个外形委琐的日本人，端着枪，躲在暗处。对于战事朦朦胧胧，对于战争的输赢胜败完全没有判断力。他只是端着枪，立在他的岗位上。这种时候日本人见到，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出现了另外一个人，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钢盔下面有令人惊羡的红润的脸。年轻人用登山运动员一样的步伐，而不是一种对有威胁之敌的步伐。他在走路。眼神中有一种忧愁。日本人对突然出现的美国兵甚至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感情。这种“依恋”是日本人选用的词汇。我所理解的不是“依恋”，它更接近于由某种原因不明的敬畏带来的迟疑。是一种黄肤色种族的成年人对于白皮肤的高大年轻人的特殊情感。端着枪的日本人曾经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学者。战争来了，他同样被安置在战争的沟壕里。手上有枪，枪膛中顶满了子弹。他的手指正停在扳机上。他深深地知道，在这个位置，这一时刻之中，还有另外的他

——人性的他。那些怪东西使他想到了对方的母亲，感到了对方还没有丝毫的作战经验，连藏身的训练都缺乏。

开枪是一个士兵的本能，只是动一下手指头的事情。然后，对手应着枪声倒下。类似用手挥一下镰刀，眼前倒下一棵熟透了的老玉米。但是，叫大风升平的日本士兵没有发出动作，他让那个脸上现出白种人种特有红润的美国孩子退回到敌方的安全地带。

有这样的人，他的内心，在任何时候都洪水汹涌。像扣动扳机这种简单到顶的一个动作，被他经历得如此复杂。并且，他要把那个犹豫再三的过程像剥掉蚕茧上的丝一样，一层一层地掀开，记录下来，把它告诉给其他的人们。

我们不是在活着的同时，还经历着这一层层死的苦难吗？

画家脚底下是调色板，各种颜色堆积着。红和黄和蓝之间的融合，使它变成一片模糊不定的脏色。它是画家遗留下来的固体垃圾。画家可以扔掉调色板，重新换一块纯粹的洁净的木板。但是，我们不可以。我们的心既是木板，又是已有的全部颜色。画家是他自己本人，又是他手中的那把画刀，又是他脚下的全部颜色。除非把这一切全部丢掉，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干净，除非我们不存在。

在不能马上从这世界上消失之前，我们是不是要清理我们自己？是不是要回过头去感受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话要把它说出来？

六

虽然，不可能有答案，我仍旧要去追问。究竟该派哪一类人去受难？假设我们人类能够拿到选择的权利。

七

八十年代初，我到南宁去组稿，接触到一个电影剧本，描写了中国东北农村四十年代末遭受到的一场惊人的鼠疫蔓延。作者是南方人，会讲几句东北方言。他所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剧本中间的细节都忘记了，却清楚地记住了他作为一个卫生防疫人员进入空无一条生物的村屯里去，看见横卧在土炕上的一具具尸体。他用特殊的声调说：点起火来烧，全是浓烟，整个村屯里全是焦糊的死气。

后来，我问过几个年长的北方老人，他们或者抽着烟，或者捋着烟叶，或者摘洗着青菜，淡淡地说，好像有那么一年，乡下“闹防疫”。有这事儿，死了点人。

无声无息地，人就消失了。后来的人只说是“闹防疫”。

类似的事件，也许在有关部门和县志之类的文字资料中会有简略的记录，毫无情感色彩，很可能只是一些数字的罗列。

北方，黑油一样的土地上，重新又出现了人的踪迹。只要有泥土，房屋就垒起来。夜晚的压抑，使人钻到窝棚里，避开风雨寒冷。早晨，再站到天和地之间。两腿之间窜着风。种子从人的手指缝里均匀地落进被翻开的土地。除了人能讲述，面无表情的河流、岩壁、枯树和茅草都不能。可是，死去了的人，已经不能再说话。

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一批批城里的学生站到了缄默不语的土地上。

我在一九七四年春天下乡，在我之前之后十年里，中国有超过一千六百万的学生到农村去。在我们集体户向西南走一里地，有另外一间知青集体户。转过来，向西北方向，二里地不到，又有一间知青集体户。

我拖拖拉拉地拽着锄头，从地里回来，看见我们的土炕。炕席上有一副磨黑了的象棋盘。它几乎是我们的全部娱乐。冬天和下雨的日子，总有人挪开炕上堆的行李和粮食口袋，寻找丢掉的棋子。然后，盘腿上炕说：杀一盘。

一千六百万人，都有绝不雷同的记忆。但是，谁也不可能征集到他们的全部印象。不可能一千六百万人每人有一篇自述。谁也不可能迫使所有的人都讲话。虽然，他们中间的多数还都活在这个世界上，早晨还能够站起身，在肮脏的公厕门口遇见了邻居，还能够互相招呼，还能骑上残旧的自行车去工作。他们像在早餐中咽下一个馒头那样，把过去的经历都咽下去了。滋味已经淡忘，描述不清。或者他们不准备再说再想。

一九七四年，我被一个赶毛驴的人领到完全陌生的黄泥小屋里，那就是我的集体户。

我靠着一根木头柱子，守着它，我无声地坐了几个小时。等着天快黑下来，等着第二天闷着头到地里去干活，等着面对完全陌生人群的尴尬快过去。有年龄大的女生在炕上不停地走。我看见又肥又胖的脚，粗糙得跟炕面的泥一样的人脚。那天傍晚，就遇到了她们吵架，隔着长条木板桌，互相对泼着稀溜溜的小米粥。张开嘴，骂出不堪入耳的粗话。

那几个女生都在六八、六九年下乡，在黄泥小屋里住了五六年。眼看着一批一批人被抽调回城，她们的内心极不平衡。按今天的观念，她们早该去看心理医生。推算她们当时的年龄，不过二十五岁左右，比今天的我年轻得多。但是，她们那种残落破败的心态已经不可收拾。

一九七五年，我听说，我们的邻县，一个六八年下乡的女生因为回城绝望，在做饭的时候，往粥锅里下了耗子药，毒死了全集体户的知青。我理解投毒者的处境，她们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又常遭到后来知青们的嘲笑耍弄和轻蔑。那种绝望，在她们身上随时会